

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

川大史学

历史地理

卷

王小红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地理 

川大史学

王小红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吴雨时 王小红(特邀) 王智勇(特邀)

责任校对:周 颖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95-2

I. 川... II. 四... III. ①史学-文集②历史地理-文集 IV. ①K0-53②K90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072 号

书名 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

主 编	王小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180.25
字 数	423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1 300 册
定 价	450.00 元(全七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冉光荣	石	硕	孙锦泉	刘复生
任新建	何一民	何	平	罗志田	陈廷湘
杨天宏	徐亮工	郭	齐	彭裕商	舒大刚
蔡崇榜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应平	孙锦泉	李德英	陈廷湘
杨秀春	徐开来	舒大刚	鲍成志	霍 巍

秘 书：辛 旭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揆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棣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色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铤、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前 言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其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875年创办的尊经书院，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百余年来，历史学从只有历史课程讲授，到设置史学科、史学系、史地系、历史学系，到如今的历史文化学院，学科专业逐渐增多，研究内容也日益丰富。作为目前四川大学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历史地理学，也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历史地理学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为主要内容，它与以时间为研究线索的历史学和以空间为关注对象的地理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时间和空间正是一切事物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所以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就和地理研究相形相随，在中国历史文献四部分类中，专属历史学的“史部”下分设“地理类”，其又分为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等九种。其中的有关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迁之作，即为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历史地理学一直就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历史学一级学科下设有历史地理学作为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的重要支撑。据此，我们探讨一百多年来历史地理学在川大的发展，可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

在传统阶段,没有专门的研究队伍,主要是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史等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些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和实践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正式建立的重要保证。

还在锦江书院、尊经书院时期^①,当时的师生如王闿运、廖平等在从事经学、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作一些地理考证:如王闿运研究《尚书》,对其中的《禹贡》作释地研究;廖平在《地学杂志》发表《〈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等。到了20世纪,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的学术分科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西学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中国各大高校历史系的设置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的。国立四川大学也不例外,其前身之一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1924年设立了10个系,历史学作为其中之一,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单位,其后发展成为国立成都大学史学系。1927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于1929年又设立史学系。这两校史学系的课程均按新的学术分科设置,其中包括历史地理学、历史地质学^②。其历史教师重视历史地理的研究,如张森楷治史,“即发起地理、人物两大纲,作为史学校勘着手的基础”,撰有《形势险要考》、《历代地理沿革表》等历史地理著作,并历时五年编成《合川县志》;祝同曾也为林思进主编的民国《华阳县志》撰疆域、事纪部分;蒙文通曾将地方志的兴衰与整个史学的兴衰联

①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学术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钱穆在《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中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参见罗联添编《国学论文选》,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4月)所以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书院等,强调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并以经学为主,虽然史学早已产生,但治史者往往经、史兼治,故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的主要学术为经学。

② 《国立成都大学一览·各系课程》,国立成都大学,1929年,第51~56页。

系在一起^①，《古地甄微》就是蒙先生兼治地理之学的重要结晶，而其成名之作《古史甄微》其实也是“历史人文地理”的代表性成果。

1931年11月，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联合组成为国立四川大学以后，史学系继续发展，其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更加蓬勃开展。在科研方面，1935年12月25日川大史学系成立“历史研究会”，其第一项活动就是“调查成都近郊”，并计划出版专刊^②。1939年4月，该会改名为“史地研究会”，其研究部设有“地理组”、“西南民族组”，开展了多项实地调查工作。1936年5月，四川大学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目的是“对西南诸省之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等有彻底之研究”。^③这一机构的成立，不但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之学术风气，也使川太历史学之研究开始注重实地考察与区域研究。在教学方面，自川大史学系创建之初，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就成为两门必修课。例如，在1936年川大史学系执行的新历史教学方案中，就开设有这两门课，中国地理由北师大地理系毕业的郭秀敏担任，世界地理则由徐子明担任，所以当时的史学系形成史、地结合的教学体制。在1940年史学系的12人中，就有四分之一的人从事地理学方面的教学。1941年，史学系正式更名史地系，史学研究更注重时、空的综合，国内许多著名地理学家如王文元、黄逢昌、余俊生等曾在史地系任

① 蒙文通：《〈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序》，《蒙文通文集》卷四《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第107～108页。

② 该出版计划后来流产了，但完成了调查工作。

③ 《任鸿隽氏谈整顿川大》，《北平晨报》1936年5月19日剪报，“国立四川大学档案”第17卷。

教。^① 20世纪40年代以后,“巴蜀研究”逐渐成为川大史学系的区域研究课题,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第三卷(1942年)为“巴蜀文化专号”,徐中舒、卫聚贤、姜蕴刚等撰文,这是历史学研究注重时、空结合的产物。同时,在人类学、考古学、区域史的研究中,也关注“空间”。任乃强曾说:“窃以为地学当为各科学之基础,盖万事万物莫不受时空之影响也。因是,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于历史地学之研究,民族研究亦因此始。”^② 其转入民族学研究,也是从地理研究开始。1947年,在教育部的命令下,川大将史、地分设,地理系转入理学院,史地系名称宣告结束,然而,注重“空间”(即地理)的研究仍是川大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以上是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国立四川大学的情况。

作为四川大学另一前身,私立华西协成大学(以下简称华大)也有相似的情形。虽然历史系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1933—1935年,后分别与社会系、哲学系合并),但从事史地研究的教师很多,而且很多是外国人,如1922年,在该校任教的莫尔思(W. R. Morse)、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等人倡导下,创建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开展了对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社会、民族等的研究,并于次年创办了英文学术期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到1946年停刊的20多年时间里,共发行了6卷20册。其中,自1940年起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编,其中历史、地理论文有数十篇。该研究会在华大学术界也开创了实地调查之

① 见相关年代的《国立四川大学教职员录》、《国立四川大学校刊》。

② 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自序》,《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风。1942年，又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开展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边疆社会史地研究。该所第一任副所长李安宅极力主张“实地研究”之风，其成员也均有实地调查的经验，如郑象铨先生从事地理学研究，曾亲往西北考察。

以上情况，正是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史地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由此可知，2000年来地理学长期附属于历史学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他们的关系正趋向“伙伴学科”。这种学术风气的改变，客观上促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孕育和发展。尤其是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和1934年成立的“禹贡学会”及其开展的研究活动，对这一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分别创办了《地学杂志》和《禹贡》半月刊，一大批地理学和历史学家纷纷撰文，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各方面的问题。作为处于学术研究前沿的四川大学史学学人，如蒙文通、闻宥、徐中舒等也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文章。

而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大批著名学者群聚西南，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阵地，正如顾颉刚在《史学季刊》发刊词中所说：“抗战以来，大学多迁西南诸境，加以旧有，其设置史学系者且十数。”作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四川大学，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13所国立大学之一；而另一前身、外国学者云集的私立华西协成大学，是中西学术碰撞之地，这二所学校首当其冲成为流寓西南的众多学者的理想的学术研究的天堂，所以不同学术流派在川大校园传播、融合，为川大学术注入了新的风气，川大史学由此也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我们从当时在川大、华大创办的各种有关社会文化、史地研究的学术机构、发起及主办的刊物可以略知一二。据不完全统计，从20年代到解放前，在这两大学校先后成立的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国立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1935年发展成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研究会，

1939年更名为史地研究会)、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国立四川大学博物馆、华西边疆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中国文化研究所、民族狂飚社、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等与史地研究有关的机构,创办的期刊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成大《史学杂志》、《史学季刊》、《狂飚半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川大史学者参与发起的刊物也很多,《文史杂志》、《风土杂志》、《责善半月刊》、《说文月刊》、《边政公论》、《康导月刊》等,另外还有各系的内部刊物,如《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期刊》,川大《史学论丛》等。参与这些学术机构及刊物发起的川大历史学人有谢国安、祝同曾、李思纯、黄文弼、蒙文通、任乃强、李季谷、束世激、徐中舒、冯汉骥、李安宅、丁山、闻宥、姜亮夫、郑德坤、蒙思明、吴天墀等,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古代史、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地方史及史地调查的论文及报告。

解放后,华西大学文、史学科并入川大,因此前许多教师同时任教这两所学校,故调整后的川大历史学的发展还是秉承原来的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史学研究注重“空间”。虽然没有专门的历史地理专业教师,但从事古代史、民族史、考古学、地方史研究的学者如冯汉骥、胡昭曦、张勋燎、刘琳、冉光荣等发表了不少与历史地理相关的论文。

“文革”期间,川大史学发展缓慢,学术成果不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育部进行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历史学一级学科下设有历史地理学作为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获得了新生,进入了相对独立的快速发展时期。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率先在国内开始培养研究生,此后不久,川大历史系有了专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队伍,9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主攻区域历史地理、历史民族地

理及历史地理文献等研究，在这三方面做出了令学界称道的成绩。

纵观川大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 时空结合。在进行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如古代史、民族史、考古学等研究的同时，注重对“空间”的关注，时空结合成了川大历史地理学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

2.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如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阶段，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主要由从事古代史、考古学及民族学研究的学者进行的有关疆域、政区、地名、水道变迁等传统历史地理内容的探讨；在8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地理学进入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研究时期，有了专业研究队伍，并进行专门人才的培养，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教学。

3. 一脉相承性。就研究内容而言，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注重历史地理文献、历史民族地理及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关于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传统阶段以先秦地理文献研究为主，尤以对《山海经》、《禹贡》、《水经注》的研究较多，郑德坤、蒙文通、徐中舒先生在这方面作过大量的研究。到了8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地理学继续发挥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传统，但主要是对地理志进行研究，如刘琳、任乃强先生对巴蜀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的研究，郭声波、李勇先、王小红等对宋元地理总志的研究。

关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传统阶段以巴蜀文化地理研究为主，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如孙次舟、郑德坤、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鏞、童恩正等；在现代阶段，则主要转为对巴蜀城市地理及地理环境的研究，如任乃强、刘琳、郭声

波等。当然，在传统阶段，也有对四川大学所在地成都市的地理及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在这方面作出了较大成绩；在现代阶段，也有对巴蜀文化地理的研究，如邓少琴先生的《巴蜀史迹探索》、《巴蜀史稿》及《近代川江航运简史》、《西南历史地图集》、《西南交通史》等论著。另外，原成都工学院土木水利系（成都工学院于1978年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1994年合并入今四川大学）的熊达成、郭涛等学者在成都水利、尤其是都江堰水利史的研究方面成果也很显著。

关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在传统阶段，其前期主要进行川康及青藏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调查为主，在这方面，解放前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华西边疆研究所及国立四川大学的民族史研究的老师们如莫尔思（W. R. Morse）、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等一大批外籍教师及谢国安、任乃强、邓少琴、李安宅、于式玉、刘立千、郑象铨、谭英华等先生作出了很大成绩，发表了许多考察报告及论著。同时，川大学人也注重对当时学界普遍关注的中国先秦、秦汉各少数民族的研究，如蒙文通、徐中舒等。在现代阶段，历史民族地理以研究历史时期羁縻州的设置与建设等为主，郭声波先生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本次编纂的《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选取川大教师历年发表的有关以上三个专题的历史地理学术论文，每人一篇，汇为一卷，借以再现川大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论文选取的原则：已经过世的先生，编者自行选取；健在世上的，则由作者本人提供较有代表性的论文。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故本论文集的选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川大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概况。另外，由于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大，解放前写就的论文不一定符合今日的学术规范，但为了真实反映当时的学术研究宗旨，再现川大历史地理学的学术源流，故全部照录全文，只对引用文献材料稍作